

俄汉词典 编纂学研究



图书馆印



俄汉词典编纂学研究

鲁 桓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É HÀN CÍDIǎN BIǎNZUǎNXUÉ YÁNJIÚ

俄汉词典编纂学研究

鲁 桓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12-4/H·185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3 千

印数 8 00 册

印张 9 1/8

定价: 3.50 元

目 录

1. 序言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楚祥 (1)
2. 刘泽荣和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编审潘安荣 (3)
3. 《大俄汉词典》编纂的经验和教训
.....陈楚祥, 黑龙江大学副研究员郭育英 (17)
4. 编写《汉俄词典》的一些体会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顾柏林 (28)
5. 俄语成语及《俄汉成语词典》的收条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纪生 (36)
6. 俄语作为外语的同义词词典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超尘 (50)
7. 漫谈《俄语 8000 常用词词典》
.....黑龙江大学研究员潘国民 (64)
8. 为编好我国的双语辞书而努力——《俄语疑难用法词典》编后回顾
.....山东大学副教授叶瑞安 (77)
9. 论《俄汉双解详解辞典》
.....吉林大学副教授刘相国、谭林、张良奎 (84)
10. 《苏联百科词典》中译本词目的处理(摘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张娟云 (90)
11. 我们的尝试——编写一部《俄汉文学翻译词典》

-北京大学教授龚人放 (96)
12. 俄罗斯姓名及一部较为理想的词典
四川外语国学院教授蒋锡淮 (104)
13. 俄语新词的研究与新词词典的编纂
南京大学教授王恩圻 (120)
14. 《同根近音异义词词典》简介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徐启慧 (133)
15. 关于《俄汉双解方言词典》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吕存亮 (141)
16. 开拓双语词典研究的新领域
大连外国语学院副编审张后尘 (154)
17. 分类词典及其编纂原则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金晔 (166)
18. 语言国情学和双语词典
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吴克礼 (171)
19. 语言国情学与语言国情词典
南京大学研究生徐琚 (182)
20. 浅谈词的释义.....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吕凡 (186)
21. 提高外汉双语词典质量的关键
黑龙江大学副研究员鲁桓 (193)
22. 谈俄汉词典词目译文的准确性
辽宁大学副教授那纯志 (205)
23. 为副词在词典中“争座位”
黑龙江大学研究员李锡胤 (214)
24. 简评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修订本

-上海外国语学院讲师刘令仪 (219)
25. 苏联科学院 俄语词典》(第二版)中所反映的
前缀意义的变化
.....黑龙江大学教授常宽森 (228)
26. 试评《大俄汉词典》的汉语释义
.....杭州大学许高渝 (232)
27. 《大俄汉词典》中习语的编排及释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宋正昆 (242)
28. 苏联词典编纂学的理论研究
.....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陈楚祥 (252)
29.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俄汉双语词典编纂
学术讨论会侧记
.....广州外国语学院编审张达三 (278)

序 言

陈 楚 祥

自 1975 年广州词典规划会议以来的十多年里，我国词典(包括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词典编纂的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词典工作者始终没有机会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由商务印书馆，黑龙江大学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共同发起召开的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还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它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但意义却十分重大。

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科学，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这次讨论会既有编纂双语词典的经验交流和编纂原则的探讨，也有对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俄汉词典的评论，以及关于俄汉词典体系和今后出版规划的讨论，内容十分丰富。代表们普遍感到，会议时间虽不长，但收获颇大。

关于词典的科学性和实用性问题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科学性要求词典结构严密、编排合理、释义准确、例证典型、体例统一等等；而实用性则要求双语词典必须充分考虑中国读者的特点和需要。捷克著名词典学家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正确地指出：“我们不要忘记，词典编纂者做的虽然是科学工作，但使用词典的人所追求的却总是较实用的

目的……。”^①

编纂词典也象其它许多事业一样,必须及时沟通信息,掌握动态,尤其是要对国外词典编纂的理论研究、编纂方法及其发展趋势有所了解。在这次会议上,广州外语学院的几位教授将他们正在撰写的《英俄德法西日语文词典研究》一书的内容,分别向与会代表作了介绍,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认为对编纂俄汉语文词典很有借鉴意义。

编纂词典是一项严谨的科研工作,它要求词典编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编纂词典同时也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它要求有一种献身精神。词典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当前我国四化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对词典编纂工作的艰苦性,却只有编过词典的人才深有体会。早在16世纪,法国语文学家J.J. 斯卡利格尔在一首将编词典喻为服苦役的小诗中就充分道出了词典编者的艰苦。但是苦中有乐,当看到自己的辛勤劳动对社会作出贡献,为后代留下了精神财富时,也就会感到极大的安慰。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词典事业也将大有发展,词典工作者应当高瞻远瞩,发愤图强。吕叔湘先生曾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②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不朽的事业而贡献毕生的精力吧!

① 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页。

② 吕叔湘《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载《辞书研究》1981年第2期,第9页。

刘泽荣和俄汉词典

潘 安 荣

编者按: 1986 年 10 月在广州召开的俄汉双语词典编纂学术讨论会上, 与会者一致提到了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词典》的历史功绩和刘老本人对编纂这部词典所作的杰出贡献。今特转载潘安荣同志这篇文章, 以表示我们对刘老衷心的敬佩和深切的怀念。

凡是把《俄汉大辞典》放在自己的案头, 作为经常使用的工具书的人, 想必都会对它的主编人刘泽荣同志抱有感谢和尊敬的感情。然而刘老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每当我回忆起他来, 心里总是很不平静, 这不只是因为他是我的亲切的老师, 更因为他一生的不平凡的经历, 因为他对我国的俄语教学和外交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却在十年的动乱中受到折磨, 过早离开了人世。

一

刘老是广东高要县人, 他的父亲是种茶制茶的专家, 1896 年应俄国人之聘到俄国高加索的巴统地方去工作, 十月革命前曾以武器和金钱支援过当地的革命者, 革命后被推举为劳动英雄。刘泽荣跟随父亲去俄国时只有五岁, 在家庭里经常受到祖母及父母亲的爱国思想的教育。他们教他利用到国外来的机会, 好好学习西方技术, 将来回国可以做些于国于民有



益的工作。他一方面在家里跟祖母学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用广东话背诵,听祖母讲中国历史,爱国英雄故事,另一方面在俄国人学校里上学。在巴统中学毕业后,1909年进入彼得堡大学(现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物理系;1914年毕业后去基斯洛沃茨克中学教书,当了两年数学教员,又于1916年秋进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但学到1917年春就辍学了,因为这时在刘老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国政府从中国招去几万名工人(其中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的约六万多人)。1917年2月革命时,中国工人为了摆脱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成千上万逃离工地到各处谋生。但是找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大批人流浪行乞,也成群出现在彼得堡的街头。由于生活无着,有的女人甚至靠展示自己缠过的小足来讨得几个小钱。怀着强烈爱国心的刘老,见到这种情形,感到无限悲愤,于是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办起了救济中国工人的“中华旅俄联合会”,刘老被选为会长。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组织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刘老仍任会长。苏维埃政府给联合会以极大的支持,承认刘老为“旅俄华侨和在俄中国工人的唯一全权代表”,给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的名义。列宁曾三次亲切接见刘老,并亲笔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给刘绍周同志一切协助”(刘绍周是刘老在俄时用的名字)。刘老和联合会

还受苏外交部委托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发给参加苏红军的中国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阅读。共产国际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大会及1920年7月召开第二次大会时，刘老都应邀代表中国工人列席，因为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在列宁主持的第一次会议上，刘老作了简短的发言，谈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情况。第二次会议期间，在《消息报》上发表过短文。

1920年底回国后，刘老在中东铁路任理事会理事。1933年至1940年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昆明西南联大任俄语教授，培养了一批俄语人才，其中好几位现在是著名的翻译家。抗战期间的1940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改善中苏邦交，任命愿与苏友好的邵力子去苏当大使，而邵力子选中刘老给他当参赞。1944年秋，苏外交部指责中国新疆当局对当地苏联各领事馆采取不友好措施及迫害苏侨，于是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派受苏联政府欢迎的刘老为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次年刘老去重庆述职时，曾与周恩来同志见面，周恩来同志托他回新疆时打听一件事，后来他照办了。1949年9月刘老帮助和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实现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后，刘老任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1949年底，他奉周总理电召，由彭德怀同志用专机把他一家送到北京。他先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和外交部顾问。1965年起兼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他是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6年经陈毅、阎宝航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刘老在编俄汉词典上所作的贡献，是和周总理的信任和关注分不开的。刘老在1949年12月25日到外交部报到，周总理于31日请他吃饭。席间，周总理对他说：“请你先在条约委员会工作，同时着手编一部俄汉词典。”离新中国成立刚两个多月，周总理就作了编俄汉词典的安排，并且确实物色到了最适当的人选。1950年6月28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正式聘请刘老“兼任我署翻译局编审，主持编辑俄华字典及翻译工作人员之请益质疑”。7月1日起，刘老上班，每日工作半天（另半天在外交部工作）。

早在30年代初，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语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文法学院兼课）期间，刘老除编了《俄文文法》以外，就开始编俄汉词典了。那时共同工作的有王之相（北平大学教授），夏仲毅（解放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授，主编《汉俄词典》），王荣先（解放后仍随刘老编俄汉词典）等人，是业余编写的。他们以苏联的一部俄英词典为蓝本，因为十月革命后的新词典（乌沙科夫主编）当时还没有出版（到1935年才出版第1卷）。在他们编写了一半光景的时候，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北平。王之相将誊写清楚的部分卡片装箱寄存于北平大学图书馆，不料后来竟被日本宪兵发现，全部掠去。解放后虽然找回底稿，但时间已相隔近20年，不能照用了。

现在，刘老只好重新编写了。但在解放初期，要马上组织一个整齐的词典编纂班子，并不容易。在头二、三年内，先后

只有七、八人参加，成立了俄汉词典编辑室，有几位年老多病，有几位甚至中途长期病休，刘老本人又是兼职的，只上半天班，因此工作进展较慢。再加上刘老一开始就想以苏联的四大卷乌沙科夫主编的词典为蓝本，并加以增补，编成卷帙浩繁的大词典，因此更为费时。

1951 年底，苏联出版了陈昌浩等编的《俄华辞典》，这是一部小型词典，主要是供苏联读者研究汉语和从事汉译俄用的，我国读者用起来有许多不便。为适应我国读者的迫切需要，词典编辑室的同志们中断了自己的编写工作，来补充和修订这本小型的《俄华辞典》。这一工作还未结束时，苏联又出版了一部新的普及性的俄语词典（奥热戈夫编）。1953 年，增订《俄华辞典》工作结束以后，刘老改变了原来的大词典编写计划。

50 年代初期，学习俄语形成了热潮，专科学校、业余学习班、广播教学，无论正规的还是速成的，都很普遍，学习者不可计数，但都苦于没有一部合用的词典。总算盼来了陈昌浩等编的《俄华辞典》，可惜太小；刘老正在编的词典虽大，但人手不足，何时能编完，很渺茫。为了尽快满足读者的需要，刘老不得不放弃原计划，决定以奥热戈夫词典为蓝本，酌量增加一些释义和单词，编成一部收词五万多的中型词典。七、八个人从 1953 年 10 月底动手，次年 8 月编出初稿。但是刘老在审校初稿的过程中，仍感奥热戈夫词典内容不够丰富，又从乌沙科夫词典和苏联大百科全书取材来增加单词，更在注释、成语和例句上进行补充。几经努力，终于在 1956 年 12 月出版了《俄汉新辞典》上册，1958 年 12 月出版下册；1959 年 11 月出

版合订本。这是一部中型的俄汉词典，收词约 69,000 条，共 446 万字。词典出版后，刘老和他的助手们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感到遗憾，因为编辑方针的反复，致使上下册繁简不一，下册比上册厚了许多。好在中型词典的编成，只是走了第一步。于是毫不停歇，从 1958 年冬开始，在《俄汉新辞典》的基础上，化了短短一年功夫，又编成了《俄汉大辞典》，于 1960 年 8 月出版。

《俄汉大辞典》收词约 105,000，共 631 万字，比新词典增加 34,000 多个词条，近 200 万字。除了奥热戈夫词典的词条外，还包括了乌沙科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的全部单词和成语、苏联科学院编的《俄语词典》第 1 和第 2 卷（当时第 3、4 卷尚未出版）的部分单词和成语、苏联外来语词典（1954 年版）的全部单词、苏联大百科全书的部分单词条目、苏联和我国出版的俄语专业词典中的一些常用科技术语，以及刘老自己从苏联书刊中收集的新词新义和成语。

《俄汉大辞典》的出版，终于实现了刘老的宿愿。但是要知道，新词典和大词典都是七、八个人按字母分头编写，最后都集中到刘老一人身上，由他校订、增补或改写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外交部的工作他非但不能耽搁，有时甚至很忙，有一次要开连续几天的重要会议，他耽误了右眼的治疗，以致失明。他靠半天时间来编词典当然不够，因此他把夜晚的时间全部都用上了。编大词典时，这位有心脏病、年近七旬的老人，以一只眼睛，戴着放大镜，天天夜里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钟。而不论新词典还是大词典，出版以后刘老都是不拿稿费的。

刘老编俄汉词典,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是要针对我国读者的特点而编。好在他当过多年的俄语教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他每次编词典,都用蓝本,但又不受蓝本的束缚。助手们根据蓝本做出的许许多多词条,他都加以改写,增入释义、例句、成语;把一些不易为我国读者透彻了解、正确使用的单词和表达法,特别是某些常用的较重要的动词、前置词,作了细致的处理,如某些前置词的意义和用法,他是以对比的方式来编写的,便于读者接受。此外在例证上,原文词典大都从文学原著摘用较长的句子,对我国初学的读者说来不实用,而且个别语句是作家在特殊语境中的特殊用法,或体现了他的特殊语言风格,更为我国初学者难以辨别。于是刘老总是改为浅显的规范的短语,或自行编写实用的短语,一般以词组为主,非用句子不足以说明用法时才用句子,这样使词典既简明,又省篇幅。

既要词典内容丰富,又要省篇幅,刘老在这一点上是处理得较好的。《俄汉大辞典》内容之丰富,比乌沙科夫词典前进了一步,篇幅却只有它的一半强。在原文词典已收的词义以外增收新的词义,刘老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他的丰富的俄语知识。如 *порядок* 一词,乌沙科夫词典有 8 解,而《俄汉大辞典》却增至 11 解,其中第 10 解“(只用二格)*порядка*(某种)等级的,程度的;大致,左右”(附例证),当时的原文词典都没有收,到了 1960 年出版的 17 卷俄语词典第 10 卷中,才收了作为“等级”和“大致”解的两个义项。又如“*если не...*”这个常用的结构,原文词典可以不收,但对我国读者是需要的,刘老就收了,并且用“也许是,甚至是”这样的译法,表达了这

个结构的内涵意义。还有如 то-то 一词的一些译法（“怪不得”等），其确切、传神的程度也是一般非俄罗斯人所难以深刻体会到的。这种例子在大词典中相当普遍，都是刘老反复思考，多次修改，花了许多心血和时间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节省篇幅，除了简化长句以外，刘老又从某些原文词典吸收了优点，如俄语的复合词、加前缀的动词、带-ся 的动词、对应的体、动名词、有男女对应的女性名词，等等，本可以无限地扩充，词典里是收不胜收的，但读者对这些词是容易明了的，因此刘老加以严格的限制，同时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如把前缀等构词要素单独立条加以解释，便于读者自行掌握更多的词，从而使大词典不致于因滥收词条而膨胀起来，最后终于编成了便于读者使用的一卷本。

俄汉词典是双语词典，它的编法应该不同于单语的俄语词典，而要考虑汉语的特点。这一点，在《俄汉大辞典》中也体现出来了。如 вопрос 这个词，在单语的原文词典中有三个以上的义项（乌沙科夫词典有五个义项），但译成汉语都是“问题”两字，因此《俄汉大辞典》中只列了一个义项：“问题”，而在例证上把原文词典各个义项的用法都体现出来。又如 бояться 一词，原文词典有两个义项，但译成汉语都是“怕”的意思，因此《俄汉大辞典》中只列了一个义项，而在例证上把原文词典两个义项的用法都体现出来。

俄汉词典又是翻译词典。既然如此，就应给词条以对等翻译，而不求助于一长串说明文字，使读者无法使用。在这方面，刘老和他的助手们化的力气最大，真可说是呕心沥血。为了寻找恰当的汉语表达方式，刘老常常找一位同志仔细研究，

因为,在他们以前只有小型俄汉词典,而要编中型、大型词典,就有许许多多的原文词需要他们第一次定出汉语的译名,这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俄汉大辞典》出版以来读者长期使用的实践证明,它的对等翻译是成功的,是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各种语境的。

刘老对新事物很敏感,这是词典编纂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素质。象“示踪原子”(меченые атомы)之类大量科技或其他方面的新词新义,在《俄汉新辞典》、《俄汉大辞典》编纂过程中,还未见于当时能得到的原文词典,这些新词新义绝大多数是刘老随时收集增入的。又如 лайнер 一词,原文词典中只当“定期远航的大轮船”解,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已经可作“大班机”解,刘老在1956年以前就收进新词典了,原文词典到了70年代才收进这个词义。原来刘老平时大量阅读苏联书刊,随时用旧的台历纸片的反面做成新词新义的卡片。这项工作在大词典出版以后也没有停止过。

刘老是一位外交家,他在大词典中收进了不少外交词语,便于外交人员和翻译工作者使用。刘老对于欧洲的丰富的文史知识和科技知识,在词典中普遍地反映出来,有的显而易见,更多的是溶化在对等译词中。刘老素有研究的中苏关系方面的问题以及这方面的知识,也有助于他恰当地处理词典中的有关词条。举一个小例来说,如 алтайский 一词,学俄语的人很容易只理解为“阿尔泰(山)的”,而刘老有意在这个释义后面加上“阿勒泰的”,并附上这样的例证:“~ край (苏联)阿尔泰边区。~ округ (中国新疆)阿勒泰专区。”

在俄汉词典编辑室,刘老的权威远远超出室内其他人,但